

# 从效率主义到生命主义: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徐平利

**摘要:**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基于物本逻辑建构起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强调“培训工人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批量需求,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已无法诠释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中国,新质生产力这一表征数智时代生产力变革的中国话语,迫切需要中国职业教育重构一种生命主义的新理论话语体系。重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要基于人本逻辑,转变思维模式,改变话语体系,还要从中国文化土壤出发,这是以职业教育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关键词:**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效率主义;生命主义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 年度常规项目“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智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GD24CJY11);深圳职业技术大学 2023 年社科项目“深圳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6023312008S)

**作者简介:**徐平利,男,深圳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技术与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2024)03-0032-13

## 一、问题的提出

2023 年底,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印发了《“数据要素 ×”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该文提出的“数据要素 ×”与八年前的“互联网+”相比,不只是我国政策表达上的概念变化,更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体现的新质生产力的根本不同。就科技革命对工业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和引领带动作用而言,人类已经迈入“数智时代”,即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时代,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这一判断自 ChatGPT 发布并且不断升级换代以来,已经没有什么质疑和争论。人们从数字智能

引爆的对人类工作与生活的全面渗透深切感受到,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方式和运作逻辑正在被颠覆。数智技术引领的这场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比数百年来的任何一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都更为宏大和深远。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大变革历史阶段,任何抱残守旧者都会被淘汰出局。旧的生产逻辑和发展模式不再适宜,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教育理论也不可能解释新的生产逻辑和发展模式。因此,教育理论工作者必须“全面反思与升级教育理论,包括知识观、学习观、教学观、课程观和人才观”,重新回答“什么是知识”“什么是

有用的知识”“我们为什么而学”“教育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等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sup>[1]</sup>。事实上,我国教育理论界已经展开了对数智时代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而且有学者试图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和对教育本质的再思考置于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语境当中<sup>[2]</sup>。在概念理解上,“数智时代”是就历史时间坐标而言,指向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中国教育”是就地理空间坐标而言,指向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不过,我国教育理论界将时空坐标进行综合观照的研究成果较少。总体来看,教育技术学专家偏重于数智时代教育变革研究,教育基本理论专家偏重于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构建。对作为一种“类型”的职业教育的研究,其成果也存在这种“隔离”现象,有的只谈数智时代职业教育变革,有的只谈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

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一直在努力构建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甚至使之成为近十多年来职业教育研究热点之一。就已有研究成果而言,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缺乏对历史坐标的观照;二是没有使职业教育“找回自己”和“关心自己”。这两大问题交织在一起,使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思维囿于传统工业化。笔者认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实质上是“话语体系”的建构。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一直囿于西方现代性模型,其核心概念是产品标准化和人才规格化。例如,有学者强调从跨界性、职业性和应用性赋予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同等地位<sup>[3]</sup>,有学者把产教融合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sup>[4]</sup>,也有学者把职业性和技术性作为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sup>[5]</sup>。此外,我们还可以从不同研究中找出关于“职业教育本质属性”的适应性、中介性、产业性、应用性、多样性、生利性、大众性、职业导向性等不同表述。有研究者对上述观点提

出批评,认为是概念界定不清,将职业教育本质属性或特征等同于职业教育的本质<sup>[6]</sup>,或者是把职业教育功能混同于职业教育本质<sup>[7]</sup>。一些研究者试图从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出发,提出把“职业技能授受”<sup>[8]</sup>或“技艺授受”<sup>[9]</sup>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建构的“基点”。以周明星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尽管提出了“依据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现代职业教育特性,建构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的逻辑体系”,但是在微观的核心问题界定上仍然局限于“如何对接产业标准适切授受职业态度、知识和技能”<sup>[10]</sup>,在研究视野上仍然停留在主张摆脱学科体系思维而建构跨学科或跨界性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sup>[11-14]</sup>。大致说来,批判“学科性”而建构“跨学科性”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既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界的共识<sup>[15]</sup>,也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工作的局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研究者从技术哲学视角探讨“技术生存”<sup>[16]</sup>或“技术特征”<sup>[17]</sup>作为职业教育理论基础的可能性,这是很有价值的,但有些探讨仍然没有走出传统工业化和西方现代性的局限,往往是先入为主地只看到技术哲学的“技术性”,却无视技术哲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研究领域。由于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思维和建构话语的局限,研究者关于职业教育理论基础的论述也就必然是拿来主义的大拼盘。例如,有研究者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说为现代职业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础”<sup>[18]</sup>,有研究者则把系统论、需求层次论、产教结合理论、产业发展理论拼凑在一起作为理论基础<sup>[19]</sup>。于是,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跨学科”往往变成了对其他学科话语的“窃取”。

总之,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目前仍然滞留于旧模式和旧时代,还没有站在数智时代的生态园里建构职业教育理论的中国话语体系。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当下正在发生的这种现象:尽管职业教

## 理论前沿

育在政策话语上被赋予重要地位,在理论话语上也显得热烈而强健,但是一旦遇到必须深入推进的职业教育实践,通常就会不由自主地显出无力感和无能感。从这种现象我们看到,职业教育的知与行在当下往往呈现一种割裂状态,这种状态使职业教育从业者和观察者在对于职业教育的社会情绪上均显得浮躁而焦虑。进一步分析现象背后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现行的作为“类型”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曾经行之有效,但是在解释和应对新质生产力及其发展模式时却已经力不从心。这说明,改变势在必行。

本文要思考和论证的问题是:当人类已经迈入数智时代的时候,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应坚守传统的“效率主义”,还是说需要转向一种与之不同的“生命主义”?本文认为,基于传统工业时代物本逻辑和规格要求而建构起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在数智时代的存在基础正在消解,因此我们需要重构一种适应新质生产力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本文将从三方面进行论证:一是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及其建构逻辑;二是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需要新的职业教育理论;三是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重构审思。

### 二、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及其建构逻辑

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生成于工业时代,演变于工业时代。传统工业时代有三大职业教育话语体系,都有其存在合理性,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效率主义话语体系,也称泰勒主义或福特主义,是传统工业经济对高效率技能型劳动者批量需求的必然反映,物本与效率成为其理论建构的基本逻辑。

#### (一) 本文对“传统工业时代”的定义

众所周知,以学校为载体的职业教育制度是人类工业革命的产物,并且这种制度随着工业化的不

断深入而不断调整内核和形式。一般认为,人类至今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第一次发生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称作“蒸汽机时代”;第二次发生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期,称作“电气时代”;第三次发生在20世纪中期至21世纪初,称作“信息时代”;第四次发生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的当下,称作“数智时代”。正在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三次不同,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通过技术革命来提高“人的工作技能”,这个本质没有改变;但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却是直接用“机器工作技能”取代了“人的工作技能”,它所形成的新质生产力要素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者”概念需要在人工智能场景中进行重新理解。因此,我们从数智时代的基本特征出发,把前三次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具有相同本质的工业时代统称为“传统工业时代”。当然,数智时代和传统工业时代不是截然分开的,新旧生产力在不同时代交织存在。但是,教育的发展却不能因此滞后守旧,而必须选择为新的生产力服务。

#### (二) 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

话语是一种具有关系性和功能性的系统存在,“建构到人借以造就自身的那些功能的整个经济结构中去”<sup>[20]</sup>。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可分作三大体系:审美启蒙主义话语体系、工业效率主义话语体系和实用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生成于“蒸汽机时代”。这个时代属于“原始工业化”<sup>[21]</sup>阶段,农村与城市、手工业与机器工业激烈交锋,但是工厂技能劳动者需求却与日俱增,因此瑞士启蒙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尽管身在乡村农场,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工业学校(industrial school)”<sup>[22]</sup>。裴氏认为“一切都变动了”<sup>[23]</sup>,他坚信职业教育是通向人类真正教育的大门,主张“必须多办训练职业技

能的机构,必须培养各个行业的专门人才,使成人各个有专长有职业”<sup>[23]</sup>。裴氏受到当时启蒙哲人群体中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建构了审美的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他在著作中的常用词是大众权利、公民教育、职业技能、直观教学、适应生活、神圣天性、心的连接、专门人才、有用成员等。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是初等教育层次,与公民教育是一回事,不存在职业学校和普通学校两个系统,不存在规格、标准、匹配、效率之类的话语。不过,审美启蒙主义并非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裴氏也曾说过,在“用字词给一些概念作哲学式的切实定义这方面”成效甚微,但他不是没有哲学探究的能力,而是时代现实要求他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实践家<sup>[24]</sup>。

“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生成于“电气时代”。值得指出的是,在“审美启蒙主义”和“工业效率主义”两种理论之间,有一个关键性过渡人物,他是“德国职业教育之父”凯兴斯泰纳。凯氏向上继承裴斯泰洛齐思想,提出现代国家学校或国家公立学校概念,称为“工业学校”,也称为“劳作学校”(work school)或“职业学校”(vocational school),学校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公民”,公民“必须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国家的某些职能,或者说他必须从事某种职业”<sup>[25]</sup>。像裴斯泰洛齐一样,凯氏没有把职业学校和普通国民学校分开,也没有使用规格、标准、匹配、效率之类的概念,但是他放弃了裴斯泰洛齐的“审美”话语,强调了职业学校的“技术教师”“教学集中性”和“学校成为学生未来职业的准备场所”<sup>[25]</sup>等话语,既为“双元制”职业教育理论建构埋下伏笔,也为“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建构埋下伏笔。“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是美国“社会效率运动”及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教育改革上的直接产物。美国人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受益最大,对传统教育的“低效无用”感到不满,一些改革者呼吁学习德国职业教育,建立实用性的国家公立职业中学,以此“服务寻求职业机会的人”和“高效生产的社会”<sup>[26]</sup>,这一改革最终因着1917年国家教育立法而落地。“工业效率主义”相较“审美启蒙主义”有三大变化:一是把国民学校分成两类,其中一类为专门的职业学校;二是把职业教育从初级层次提升到中等层次;三是以“最大程度的效率”为职业教育目的。<sup>[27]</sup>建构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有“职业教育应当发生于最逼真的工作环境”“职业岗位培训内容的唯一可靠的来源是职业能手的经验”<sup>[28]</sup>“使个人为有用的就业做好准备”<sup>[29]</sup>,以及“人力是资本”“工作即商品”“职业教育培养岗位工作技能”<sup>[30]</sup>等。由于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以特定的职业期望和工人生产产品为导向,为每个学生提供一种适销对路的工作技能”<sup>[31]</sup>,满足了传统工业经济对标准化、合规格“高效劳动者”的需要,因此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了统治地位,即使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也没有得到较大改变。

“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物,也生成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建立了实用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由于同样生成于美国“社会效率运动”以及“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时期,因此“实用主义职业教育”和“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两种理论话语产生了激烈交锋。杜威特别反对“二元论”,因此也特别反对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开办独立体系的职业学校,他直言自己与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代言人斯奈登之间“存在深刻的社会、政治和教育分歧”<sup>[27]</sup>。杜威为“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出场和生存提供了五点理由:“一是在民主社会中,体力劳动和一切生产实践活动受到尊重;二是工业性的职业使学校教育

## 理论前沿

必须重视工业生产和就业问题;三是工业生产需要技能知识;四是知识追求变得更有实验性;五是操作、探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sup>[32]</sup>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可以用“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经验即探究”进行概括,这一话语体系的基本理念是从裴斯泰洛齐出发的,但是在职业教育哲学思想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建构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审美启蒙主义的原始工业化。实用主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追求教育理想的理论话语,自诞生后就被广泛接受,但是在实践中却很少被各国政府纳入国家主义教育制度体系。

### (三)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逻辑

现代职业教育在人类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中诞生和发展,与国家经济政治息息相关。18世纪末,裴斯泰洛齐为什么要创办职业学校?因为在那个蒸汽机轰鸣和思想启蒙的环境中,裴斯泰洛齐看到了“人”与“工作”的严峻问题,他要“为废除社会特权、争取公民平等而斗争”<sup>[33]</sup>。当时,“受过教育的工人(educated worker)”这个概念已经被提了出来,裴斯泰洛齐最初的想法是“希望创造一个真实的环境,将农业劳动和发展工业的工作联系起来,为贫穷儿童进行谋生教育,使他们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克服贫困”<sup>[34]</sup>。裴斯泰洛齐的办学目的不是为了提高雇主的工厂生产效率,而是为了救赎和启蒙。他说:“成千上万的儿童被迫在街上流浪,他们需要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应该学习阅读、写作和算术。我要尽可能多地接收这些可怜的孩子,教他们读书,教他们编织。他们需要一个温暖的家,他们要走在正道上!”<sup>[35]</sup>因此,裴斯泰洛齐主义的职业教育是救赎或审美意义上的启蒙主义,不是效率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和职业主义的。在当时新旧政治力量角逐的欧洲大陆,各国政府都不得不

面对失业、危机、就业、教育等等重大问题,因此,裴斯泰洛齐的办学思想才能被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开明君主共同接受,将其作为各国实施国民教育的基本理论。由此可见,启蒙主义职业教育的建构逻辑符合蒸汽机时代的政治冲突特征,它的意义在于使学校教育从贵族向平民转变、从特权阶层向全体公民转变、从上层思想向下层劳动转变、从无用知识向有用技能转变。“启蒙主义”前面加上“审美”限定语,是裴斯泰洛齐“救赎之爱”对工具理性主义的矫正。

为什么人类工业化进入电气时代会出现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因为此时资产阶级已完全登上国家政治舞台,于是在市场竞争中快速提高国家工业效率成为各国政府的头等大事。这时期,德国经济后来居上,美国人看出了德国经济的职业教育秘密,即“工人是国家资产中最有价值的,拥有这一资产的国家将是一个成功的竞争者”<sup>[36]</sup>。借着科学主义盛行和美国社会效率运动,一些改革者主张大力提高教育效率。那么,其路径何在?此时,两项影响颇大的科学实验成为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建构的科学基础。一是泰勒的“服从机器”科学管理实验,得出了“生产线是确保劳动者服从所设计的工作流程的一种手段”的结论<sup>[37]</sup>,影响到课程目标“细分化”和课程内容“产品化”。用“职业教育课程论之父”博比特的话来说,即“从头到尾的工作都是为了同样的产品”<sup>[38]</sup>。第二项是桑代克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技能培训转移没有发生,学校教育的最好效果是接近工作环境”<sup>[39]</sup>,影响到职业学校的独立设置以及“校长即经理”和“教师即工头”等理念。尽管不乏反对声音,但是因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士兵和劳工培训的迫切需要,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被时任总统以签署法令的形式确认下来。后

来,按照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戈尔丁和卡茨的说法,20世纪成为“美国世纪”和“人力资本世纪”,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作为提高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而被推广开来<sup>[39]</sup>。

实用主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生成逻辑来自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技术是实用主义哲学绕不开的核心话题,但是实用主义是在探究的意义上看待技术知识的,认为“探究性”一方面消除了技术知识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决定了技术知识必然生存于“工作情境”中。杜威批评说,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知识“二元论”从知识确定性观念出发,“认为生产科学低于那些理论的知识与实践的知识”<sup>[40]</sup>,已经无法解释现代劳动的探究性特征。基于此,杜威创建了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哲学话语,他指出劳动过程就是探究过程,具有教育价值,劳工阶级在现代社会获得了教育权利,职业教育既有民主思想做基础,也有知识论逻辑做基础,职业教育和自由教育不是对立关系,而是融通关系。

回顾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的建构逻辑,三大理论话语体系既有联系,也有很大不同。我们看到,尽管人是文化存在,但是“随着工业化的持续,发展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单位所需的物理资源数量大幅增加,被认可的人是在经济上作出贡献的人,职业教育被迫将人视为一种经济存在,而不是文化存在”<sup>[31]</sup>。因此,职业教育的历史就演变为一部人类努力提高自身技术技能,进而努力提升其经济地位的历史,基于物本逻辑和规格要求而建构起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就在传统工业时代居于统治地位。当然,在传统工业时代也始终都有笼统地反对全部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及其制度框架的人。例如,美国新人文主义领军人物白璧德就彻底反对职业教育和专业课程,他强调精英教育和

古典课程的重要性,认为文明的希望不在大众而在精英身上<sup>[41]</sup>。今天,尽管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已经通过与普通教育相融通等方式而对效率主义色彩有所淡化,但总体来看,从美国发端的工业效率主义职业教育理论对其他经济后发国家的教育影响是巨大的。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就是基于这种工业效率主义,它恰切地诠释了我国传统工业时代劳动密集型企业对技能型人才批量需求的逻辑。

### 三、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呼唤新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数智技术重新配置效率,传统工业生产效率必然被新型工业化的全要素生产率所取代。笔者认为,当传统工业化转向新型工业化、传统生产力转向新质生产力的时候,职业教育话语体系的逻辑基础应当从物本转向人本,主导思想应当从效率主义转向生命主义。

(一)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

探讨职业教育理论基础,必须做好三方面研究。一是历史逻辑研究。职业教育是人类技术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二是知识论逻辑研究。职业教育反对知识二元论,承认实践知识及其探究性特征。三是教育目的研究。职业教育是大众教育和技能教育,目的是创造美好就业生活。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类工业化和民主化进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问题,特别是在效率意义上满足了各国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批量需求。但是,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数智时代的新型工业化催生了新质生产力,传统工业时代的职业教育理论已不适应新时代要求。这是

## 理论前沿

因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sup>[42]</sup>,新质生产力的劳动者不同于传统工业化生产环境中的技术技能工人,而是掌握数智技术技能和具有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劳动者或“数智工程师”;职业教育机构也不再仅仅是为工作做准备的“人力资源池”,而是与工作世界构成开放共享生态系统的“技能型社会”。

具体而言,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的核心话语体系是工业效率主义,建构这一话语体系的效率主义物本逻辑基础在数智时代不存在了,因为“培训工人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这一根本的生产目的正在被效率更高的“数智效率”取代。如果数智时代的职业教育依然试图在“刺激—反应”的逻辑世界中谋求生存,那么职业教育既不可能实现自我拯救,也谈不上有拯救他人的技艺。刘擎教授从社会学角度评价效率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竞争逻辑和效率最大化原则,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心理的危机。”<sup>[43]</sup>因此,传统工业时代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以及由该理论体系所形成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人才目标、课程模式、教师特质等都需要发生根本变革。“新质生产力”这一表征数智时代生产力变革的中国话语,需要一种与之相呼应的中国职业教育新理论话语体系,用以赋能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二)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意义

“生命主义”这个提法可能还是一个值得推敲的、并非独一无二的命名,但是当我们让这个名称回到新质生产力下职业实践的“粗糙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是有价值的<sup>[44]</sup>。我们看到,许多毕业生拿到专业技能证书之后很难就业,因为专

业所对应的行业已经日薄西山,相关企业纷纷裁员或倒闭;但是,开设新的专业又无所适从,因为新的行业还没有完全诞生,相关企业还在创造和孕育之中。在这种剧烈变化的非确定市场环境中,职业教育还要去哪里“拼效率”呢?职业教育的唯一前途是指向“产生生命的生活”诉求<sup>[45]</sup>,走生命创造和技术创新之路;或者用实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即职业教育必须走“探索”之路,探索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发现一个人和他的工作的关系,能使他对他正在做的工作有兴趣”<sup>[46]</sup>。

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意义在于,把职业教育看作能够生态化处理人与工作关系的一种“生命现象”,强调“人”是职业教育中技术性和思想性的综合体。在数智时代,数智技术比人工劳作更有效率,但是数智技术的“阿喀琉斯之踵”没有人类思想,当然不可能有人类生命的丰富情感,而思想能够给智能机器致命一击,凡是被注入思想的职业都会在大变局中获得新生。因此,善于应变的审美生活技能正在不断挤压特定岗位的工作技能;在“就业地变成宿营地”<sup>[47]</sup>的就业环境中,公平问题、职业幸福感和美好生活体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职业教育不仅要走进经济效率和就业谋生的世界,更要走进社会公平和乐业生活的世界,职业教育必然要从社会本位的“人力资源池”角色转向个人本位的“职业创造者”角色,这不仅是关乎技术与工作的职业教育学命题,而且也是关乎“生活着的、劳动着的和讲着话的人”<sup>[48]</sup>有无大写历史的社会学命题,更进一步说,这是关乎能否看到“自由行为本身所固有的创造形式”<sup>[49]</sup>的哲学命题。

因此,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应当包括“生命、生长、生态”三大关键词。一是回归人的“生命”本质。这是新型劳动者在数智技术中坚守“人

类思想尊严”<sup>[50]</sup>的根基。二是突出教育“生长”特征。技能人才的“再技能化”围绕劳动心智和创造兴趣而不断增长。三是营造教育“生态”系统。所有人热爱并愿意接受职业教育,所有劳动者“都能在劳动中发现广阔天地,在劳动中体现价值、展现风采、感受快乐”<sup>[51]</sup>。生命主义职业教育适应技能型社会的教育生态,人们看待职业教育的眼光将不再由低学术成就、低教育抱负、低社会经济地位决定<sup>[52]</sup>,此时的劳动者应当是“快乐劳动者”。10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探讨过“快乐劳动”问题,他们认为当人束缚于劳动并且片面化发展的时候,“劳动快乐”是不存在的。马克思指出,“人的解放”是实现“快乐劳动”的前提;恩格斯指出,“自主劳动、兴趣劳动、尊严劳动”是实现“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的三个必要条件。<sup>[53]</sup>如今,这些条件具备了吗?未来学家里夫金认为“快乐劳动”正在成为现实,因为技术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劳动生态,很可能使人类进入自由劳动阶段,劳动者将进入一种“劳动的深层游戏”<sup>[54]</sup>。尽管实现“快乐劳动”仍然是人类愿景,但是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已为此提供了必要条件,而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则为此建立了理论基础。

### (三) 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的建构逻辑

职业教育旧范式的物本逻辑基础在数智时代已经失效,建构一种生命主义的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是基于“人本”逻辑。由此,我们需要把职业教育看作一种生命现象,这是就职业教育对象是“人”而非“物”而言。康德在哲学上第一次阐明了人与物的关系,他指出物是手段,人是目的,而且每个人作为目的自身而存在,必须同时把自己和别人都尊为目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常常偏离其本质,把自己或他人视为手段。尽管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抽象谈论“人是目的”,而意识到目的和手段永

远交织在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身上<sup>[55]</sup>,但就职业教育培养目的这个具体语境而言,只有回到人的生命本质,职业教育才能走出数智效率制约人工效率的困局。换言之,只有让思想牵住技术的缰绳,使职业教育回归人的思想存在方式,并进而“提高劳动者才智的效率”<sup>[56]</sup>,才能体现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的新价值。

新理论形成新范式的话语建构过程,对于旧范式来说无疑是革命性的,但是“一个新范式往往是在危机发生或被明确地认识之前就出现了”<sup>[57]</sup>。传统工业时代职业教育理论包括三大话语体系,其中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居于统治地位,它取代了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也掩盖了实用主义职业教育。但是,实用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效率主义危机的发现者。杜威很早就指出,效率主义职业教育提高的是“技术性的职业的效率”,而不是“劳动者才智的效率”,其结果必然使大量劳动者出现“技术性失业”<sup>[56]</sup>。因此,建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我们可以在实用主义职业教育那里找到思想源头。职业教育原本就有“生命性”,杜威早就提出了“教育即生长”思想,认为职业教育“能够而且有潜力发挥个人和社会的解放作用”<sup>[58]</sup>,只是在传统工业生产力场景中被工业效率主义话语体系做了“价值涂层”<sup>[59]</sup>。但是,实用主义职业教育的理论话语毕竟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进入数智时代必须进行生命主义话语重构,例如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重构为“教育即创造”“学校即共享”,在根本上从“工作即谋生”走向“工作即快乐”。在这个意义上,建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不是增加新元素,而是重构新世界,使职业教育回到人的生命本质。

话语体系的存在特性决定了其自身必然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话语重构。生命主义职业教育话语重构的理想目标是,使职业教育走出体面劳动

## 理论前沿

的制约性逻辑,以“认识自我、关心自我”的生命状态坦然应对“人机互动”新世界,进而走向自由劳动的美好人生,主要包括:(1)从物本转向人本,即转变职业教育的逻辑路径,回到生命教育原点;(2)从实践转向体验,突出个人工作感受并理解工作意义,享受目标完成的成就感,这是人工智能技术所根本缺乏的;(3)从跨界转向生态,把职业教育从经济工具所制造的分离和再融合的循环中解放出来,使职业教育在“无边无界”的生态场景中实施,培养学生与自我、社会和自然的互生共情能力;(4)从适应性转向创造性,使职业教育不再被动地挖掘人力资源池,而是创造美好生活世界;(5)从“手脑并用”转向“手脑心合一”,在职业教育培养人才中强调“技术思考,用爱连接”;(6)从雇佣劳动转向自由劳动,从就业谋生转向美好人生。生命主义不是在未来被超级人工智能机器奴役的技能谋生主义,也不是启蒙运动时期那种审美启蒙主义,而是把个体生命意义和情感体验放在首位的一种生态生长的自然境界。因此,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本质是“找回自己”,它的意义用主体诠释学的说法就是,持续地追寻和拷问“我是谁,我是什么身份,我正在做什么,我是否与真理在一起”<sup>[60]</sup>。

### 四、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重构审思

新理论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旧范式发生危机的产物,如库恩所说:“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前提条件。”<sup>[57]</sup>在论证如何建构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之前,我们需要对现行职业教育体系进行再审视,并基于此作出回应。

(一)作为“类型”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再审视

“类型”还是“层次”的问题是在中国职业教

育需要大力发展而社会吸引力不足背景下被提出来的,2019年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结论被写入国家文件,2022年该结论又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类型说”是中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业教育体系之后,对于治理制度的一种政策表达,是职业教育试图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对于健全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推进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这份文件对作为“类型”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作出了重要指引,指出“建立健全多形式衔接、多通道成长、可持续发展的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等改革方向。教育部将其意义解释为“五大转向”: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改革重心由“教育”转向“产教”,服务场域由“区域”转向“全局”,发展路径由“分类”转向“协同”,办学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sup>[61]</sup>。这种“转向”思想对于重构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应当承认,很多人并没有从这份大而全的文件中发现其理论重构价值。在笔者看来,如果不走出传统工业时代的职业教育思维模式,就像华为总裁任正非所说,如果“中国现在的教育还是沿着工业社会那种教育方式”<sup>[62]</sup>,那么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实现“时代转向”必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中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影响面很广,不仅影响到院校治理体系,而且影响到人才培养目标、课程开发模式和教师队伍建设。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现行体系在理论建构上是不是传统工业时代的效率主义?有没有出现危机?我们在体系治理上选择了“双轨并行”“就业导向”“向上打通”“职普融通”,这是非常重要而且必要的,

但是其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双轨”运行存在封闭性、选择升学人数越来越多、本科转型陷入窘境、职普融通渠道不畅、教劳职能机构分离等<sup>[63]</sup>,而且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缺乏“效度”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很多职业院校仍然存在浓厚的精英主义意识,开放分享与大众服务意识不够。应当承认,有些职业院校确实是把“类型特色”和“效率主义”画了等号,在理论话语上仍然强调物本逻辑和经济依附性(如“校长即厂长”“合格的产品”“好用的人才”),不断在线性空间维度拔高教师的“跨界性”和“工具性”,却忽视了其他维度要求,如课程开发模式还停留在满足传统工业经济对标准化劳动者的要求方面。总之,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基于人类数智时代是对传统工业时代的伟大革命,用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来讨论职业教育这一教育类型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 (二) 重构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思考

重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首要的是转变时代思维模式,从传统工业时代思维转向数智时代思维;其次要改变话语体系,从传统的工业效率主义话语转向数智时代的生命主义话语;第三要从中国文化土壤出发,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如果不在这三个方面着力,那么所有关于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的概念、范畴和逻辑都是空泛的。

第一,树立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生态思维。“生态”表示人与自然、人与他人及自身的生机、平衡、共生关系,“生态思维”是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进化、和谐发展作为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从生态思维来看,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建构,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型工业化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

新要求”<sup>[64]</sup>。进入数智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分工模式和生活样式都在改变,建立主体间良性竞争、协同创新、迭代演进的生态系统成为必然要求。因此,理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语境转向,最好是从生态思维出发,分析职业教育生命得以生长的“网状关联域”。例如,从生态思维去理解职业教育教师的“双师型”特质,就会发现这一理论范式所指向的地理学意义上的线性空间,在外延上已经不能概括数智时代多维场景中的职业教育教师特质。职业教育教师在数智时代必须学会理解和善于处理“人机关系”,建立职业教育教师的“心手脑和谐”特质。清华大学彭兰教授把“人机关系”定义为“人文精神与机器效率的关系”<sup>[65]</sup>,是很有价值的。职业教育教师必须重视职业教育中的人文精神养成,以爱的连接促成“心手脑和谐”。

第二,转向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生命主义话语。职业教育生命主义话语表明,职业教育必然从技术技能的经济效应转向社会生态效应,在产教、校企以及人与工作之间体现多维互动的共时性和共在性。在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话语中,人与工作的关系需要根据技术、商品、消费和幸福的生态联接而重新定位,职业教育和就业技能的关系需要根据人的天赋才能、职业志趣和职场生活的统一性而重新定义。例如,生命主义职业教育不再有“实训中心”,取而代之的是“产学研创中心”;不再有“就业岗位技能”,取而代之的是“美好生活技能”。生命主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生态思维的必然体现,例如发展绿色职业教育、全纳职业教育、关心自我职业教育,有针对性地培养绿色经济所需的生态意识、绿色技术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用制度保障所有劳动者的生命尊严和生活幸福,所有人热爱并愿意接受关心自我的职业教育,愿意用“心之爱”连接手与脑。这个时候的学校围墙已经消失,人的工作

## 理论前沿

方式和工作性质都发生了根本改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生命主义职业教育强调人才培养整体观,强调技能知识的连续性,反对把连续性的工作过程进行肢解,反对把完整的任务模块变成若干个训练技能点;强调技能学习生活化,强调生命的好奇心和探究欲,追求人人出彩、劳动快乐,把职业教育作为全民生活教育。

第三,建设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要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人工智能的心智计算理论是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牛顿的思想体系形成的,他们只是把认知转化成计算,因此数智时代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中建立生命主义文化连接?<sup>[66]</sup>换言之,基于生命主义建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关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建构问题。东西方文化中有各种各样的生命主义,中国文化中的生命主义推崇“天人合一”和“生命伦理”,前者蕴含和谐共生理念,有利于在数智时代新场景中建构职业教育内外部的共生关系;后者蕴含“致良知”哲学,有利于引导数智时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以“爱的联索”构建起来。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话语最早是从西方国家移植的,至今仍然没有得到改变,这种状况容易造成中国职业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焦虑情绪,比如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对职业院校的教师行为和校企合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而“双元制”在中国实践中很难取得像德国本土那样的成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在数智时代建立生命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很有必要的,这是以职业教育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 参考文献:

- [1] 王竹立,吴彦茹,王云. ChatGPT 与教育变革——智能时代教育应如何转型[J]. 远程教育杂志,2023,41(4):27-36.
- [2] 丁钢. 在世界教育理论发展中建构基于自身实践的中国教育学[J]. 教育研究,2023,44(7):16-18.

- [3] 姜大源. 职业教育基础理论探究对教育学的贡献[J]. 教育家,2018(40):57-59.
- [4] 吕景泉.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J]. 职业教育研究,2022(12):1.
- [5] 俞启定,和震. 职业教育本质论[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27):5-10.
- [6] 周志刚,马君. 对职业教育本质问题研究的审视[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9(9):5-8,15.
- [7] 廖策权. 职业教育本质的研究及述评[J].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2):76-77.
- [8] 马君. 中国职业教育学的反思与建构[D]. 天津:天津大学,2012:88-103.
- [9] 刘晓. 职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及其发展的界域[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3(27):9-13.
- [10] 周明星,高涵,聂清德,论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J]. 教育研究,2017,38(11):65-69.
- [11] 刘晓,徐珍珍.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反思与澄明[J]. 职教论坛,2017(16):5-9.
- [12] 李恩慧. 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历史发展与反思重构[J]. 继续教育研究,2018(5):46-50.
- [13] 刘晓,周明星. 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认识论、本体论与方法论构建[J]. 大学教育科学,2016(5):101-104,127.
- [14] 高倩. 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跨学科研究范式探析[J]. 职教通讯,2014(31):36-39.
- [15] 唐林伟.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样态与超越[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19(2):61-66.
- [16] 徐宏伟. 现代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基础探究[J]. 教育发展研究,2019,39(Z1):71-76.
- [17] 高尚荣. 现代职业教育的技术哲学基础论析[J]. 职教论坛,2016(4):65-69.
- [18] 王川. 论职业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J]. 教育与职业,2007(32):10-12.
- [19] 杜利.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和实证研究[D].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08:15-22.
- [20]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5.
- [21] 施多尔贝格-雷林格. 百年启蒙[M]. 何昕,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43.
- [22] FREDALENE B B, THORN G. 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 18th Century Swiss Educator and Correctional Reformer[J]. The Journal of Correctional Education, 2004, 55(4):309-320.
- [23] 裴斯泰洛齐. 林哈德与葛笃德:下卷[M]. 北京编译社,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438,747.

- [24] 裴斯泰洛齐. 裴斯泰洛齐教育论著选 [M]. 夏之莲, 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2: 9.
- [25] KERSCHENSTEINER G. The Idea of Industrial School[M]. By RUDOLFPINTNER M 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3: 15-17, 82.
- [26] EDWARD M B. Vocation, School, and Society: A Study of Late Nineteenth-Century Educational Thought[J]. Educational Theory, 1977, 27 (7) : 223-250.
- [27] WIRTH G.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the Vocational-Liberal Studies Controversy (1900—1917) : John Dewey vs. The Social Efficiency Philosophers[C]//[PAUL GOODMAN, People or Personnel and Like a Conquered Provin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169-182.
- [28] PROSSER C A, ALLEN C R. (1925).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 Democracy[M]//Company/Howard R. D. Gordon. History and Growth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merica (Second Edition ).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Inc. 2003: 268-269.
- [29] GARY M. The Smith-Hughes Act: The Road to It and What It Accomplished[J]. Techniques Magazine, 2017 (2) : 17-21.
- [30] PAUL C V. Reflections on Theories of Human Capital, Skills Training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J]. Educational Theory, 1981, 31 (2) 137-151.
- [31] THOMPSON J F. Foundation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ocial and Philosophical Concepts[M].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1973: 226, 29-30.
- [32] 杜威. 杜威全集: 中期著作第九卷 [M]. 俞吾金, 孔慧,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250.
- [33] QUICK R H. Essays on Educational Reformers[M]. New York: D. Appleton, 1916: 291.
- [34] BRUHLMEIER A, KUHLEMANN G. Heinrich Pestalozzi[EB/OL]. [2023-12-19]. <http://www.en.heinrich-pestalozzi.de/biography/overview/>.
- [35] ARTHUR B. Pestalozzi's Biography[EB/OL]. [2023-12-19]. <http://www.bruehlmeier.info/biography.htm>.
- [36] MELVIN L B. Implications from the Histor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M]. Columbus: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76: 7-8.
- [37] CHRISTOPHER WINCH. Vocational Education—A Liberal Interpretation[J].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1995, 14 (10) : 401-415.
- [38] 博比特. 课程 [M]. 刘幸,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7: 65.
- [39] 戈尔丁, 卡茨. 教育和技术的赛跑 [M]. 贾拥民, 傅瑞蓉, 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23: 35-41.
- [40] 拉里·希克曼. 杜威的实用主义技术 [M]. 韩连庆,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8-129.
- [41] 白璧德. 民主与领袖 [M]. 张源, 张沛,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19.
- [42] 新华社.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N]. 人民日报, 2024-02-02 (1).
- [43] 迈克尔·桑德尔. 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M]. 曾纪茂,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推荐序.
- [44]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 [M] 陈嘉映,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4, 53-54.
- [45] 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1.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62.
- [46] 约翰·杜威. 民主主义与教育 [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95.
- [47] 齐格蒙特·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 [M]. 欧阳景根,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249.
- [48] 米歇尔·福柯. 词与物: 人文科学考古学 [M]. 莫伟民,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484.
- [49] 伯格森. 创造进化论 [M]. 王离, 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187.
- [50] 帕斯卡尔. 思想录 [M]. 何兆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76.
- [51] 习近平. 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04-29 (2).
- [52] THEODORE L. School Reform in America: Can Dewey's Ideas Save High School Vocational Education[M]//LINDA C, CHRISTOPHER W.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Approaches, Developments and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2007: 85.
- [5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11.
- [54] 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 [M]. 张伟伟, 孙豫宁,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82-283.
- [55] 俞吾金. 如何理解康德关于“人是目的”的观念 [J]. 哲学动态, 2011 (5) : 25-28.
- [56] 杜威. 杜威全集: 中期著作第七卷 [M]. 刘娟,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1.
- [57]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 [M]. 金吾轮, 胡新和, 译. 4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74, 66.
- [58] STEPHEN B. Vocational Education: Purposes, Traditions and Prospects[M]. New York: Spring Dordrecht Heidelberg, 2011: Preface.

## 理论前沿

- [59] 沈湘平. 价值涂层、政治正确与自我规训 [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6): 84-89.
- [60] 福柯. 主体解释学 [M]. 余碧平,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387.
- [61] 中国新闻网. 教育部: 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由“谋业”转向“人本”, 绝非单纯就业教育 [EB/OL]. (2022-12-27)[2023-12-21]. <https://new.qq.com/rain/a/20221227A060UW00>.
- [62] 任正非. 任正非达沃斯发言实录: 美国不必过于担心华为的成长 [EB/OL]. (2020-01-22)[2024-01-13]. [https://www.sohu.com/a/368373006\\_114760](https://www.sohu.com/a/368373006_114760).
- [63] 王峰, 孙善学, 姜大源, 等.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笔谈 [J]. 教育与职业, 2020(20): 5-13.
- [64] 习近平. 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29.
- [65] 彭兰. 智媒趋势下内容生产中的人机关系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28(1): 31-40.
- [66] 段永朝. 人工智能思想渊源初论 [J]. 当代美国评论, 2019, 3(1): 97-109, 123-124.

[责任编辑 曹 稳]

# From Utilitarianism to Lifeism: Ref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the Digital Age

XU Pingli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an efficiency 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ed based on material logic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era. Efficiency oriented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raining workers in skills to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which largely meets the mass 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nufacturing economy. However,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can no longer interpret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eds of the digital age. In China, the new qualitative productive forces, which represen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digital age, urgently requi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theoretical discourse system of lifeism in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re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mode of thinking and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humanistic logic, and also start from the soil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is w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means to empower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heoretic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fficiencism;